政治科學論叢／第 92 期／民國 111 年 6 月／頁 41-60

從攻勢到守勢：
權力平衡、觀念轉變與澶淵之盟的形成*

唐欣偉**

摘　要

爲什麼兩個大國可以擺脫長期戰爭，轉爲和平相處？結構現實主義者認爲這要靠物質力量的平衡，而建構主義者提醒我們不能忽略觀念因素。本文藉由「杰維斯」（Robert Jervis）與「李維」（Jack S. Levy）關於學習的兩階段模式整合物質與觀念因素，以澶淵之盟爲例，敘述宋遼雙方如何先取得足以自保的物質基礎，然後再進一步擴張的過程中遭遇有能力自保的對手。再發動不只一次不成功的攻勢後，遼、宋決策者終於認知到彼此勢均力敵，並歸結出「進攻不再有利可圖」，從而改採守勢，締結和約，維持了超過一世紀的和平。

關鍵詞：澶淵之盟、政治學習、失敗經驗、信念轉變

---

* DOI:10.6166/TJPS.202206_(92).0002
本文脫胎於 2021 年 12 月 17 日發表於「歷史與國關 V」研討會的〈遼國與北宋：雄州和議、宋朝北伐與澶淵之盟〉簡報，並成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111-2410-H-002-076）之部分成果。謹此感謝研討會與會先進、國科會審查委員和期刊審查委員與編輯委員的指正建議，同時感謝國科會支持。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E-mail: hsinweitang@ntu.edu.tw。

收稿日期：111 年 2 月 22 日；通過日期：111 年 8 月 9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在中國經濟軍事實力大增後，美中兩強的競爭成爲 21 世紀初期國際政治焦點。「艾利森」（Graham Allison），聲稱當前中美的權力消長與古代雅典與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的態勢相似，呼籲雙方避免墮入「修昔底德陷阱」（Allison, 2017）。這和一甲子前提出權力轉移論的「奧干斯基」（A. F. K. Organski）之說法雷同（1958：299-338）。不論奧干斯基或艾利森，都認爲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崛起強權，實力快要趕上像美國這樣的支配強權時，爆發大國戰爭的可能性會上升。艾利森以及當代的權力轉移論者，都用「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調整後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作爲重要的國力指標。依世界銀行數據，中國 GDP（PPP）已在 2017 年超越美國，成爲世界第一（The World Bank, 2022）。

在 2017 年上臺的美國川普政府，不久後開始升高對中鬥爭態勢，調高關稅。2018 年時的美國副總統「彭斯」（Michael Pence），於「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演說，對中共進行多方面抨擊，並稱中國從來不肯與外國平等相待（Pence, 2018）。然而「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統計數據顯示，宋代中國在公元 1000 年時已是全球 GDP（PPP）數值最高的政治體（2010）；宋朝與遼朝卻能在連年戰爭後，仍有領土爭端的情形下平等相待、和平共存，締結澶淵之盟，讓雙方繁榮發展並維持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超過一百一十年。晚近艾利森也開始在討論美中關係時聲稱宋朝發明了與遼國穩定關係的概念，而澶淵之盟讓雙方建立了競爭性的夥伴關係，能在某些領域激烈競爭、其他領域密切合作（Allison, 2020: 88）。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遼宋如何由戰爭走向和平？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於 2021 年 11 月表示，美國尋求與中國和平共存而非圍堵或新冷戰（Dasgupta, 2021）。若然，那麼遼宋互動的案例就更值得參考，以利美中政府探尋，如何在衝突後邁向和解。

在 10 世紀 30 年代，契丹帝國第二代領導人耶律德光當政後，取得國際體系的領導地位（陶晉生，1984：9）。德光於 947 年攻佔中原，選用中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式的國號「大遼」，改年號「大同」（脫脫，2010b：35-39）。

大同元年的大遼帝國，可與後冷戰時期之初領導全球化的美國相提並論。後來德光因中原難以統治而撤出，繼此而起的中原政權成爲遼國競爭對手，並致力取回仍在後者支配下的傳統漢人居住地。在 960 年成立的宋朝逐步削平了鄰近政權，挑戰主導強權遼朝。經過數十年戰爭後，宋遼於 1005 年初達成了妥協性的澶淵之盟，並在此後的一百一十多年間和平往來。

「修昔底德」（Thucydides）相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眞正原因是「勢力壯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刻代蒙人的恐懼，從而迫使他們開戰」（Thucydidis 著，何元國譯，2017：19）。[1] 對現實主義者而言，這意味著權力失衡導致戰爭，而權力平衡導致和平。若將澶淵之盟視爲遼宋任何一方都未能取得優勢的結果，就與現實主義者對權力平衡作用的看法相符。

史學家曾瑞龍在研究宋遼戰爭時，曾以修昔底德的上述觀點爲起點，但在參酌了「基歐漢」（Robert Keohane）的分析後強調該論斷「並不完全指物質性的權力平衡，而具有心理空間」（2003：xviii）。也就是說，不能僅憑權力分配的狀況決定和平或戰爭。權力分配情形會產生一個心理效果，由該效果導致戰爭或和平。在研究宋遼互動的國際政治學者中，王元綱可以做爲比較簡約的結構現實主義學派代表（Wang, 2011；2013），而林挺生則引入了建構主義者重視的觀念因素（2017：83-102）。

本文主張透過「學習」的模式串聯物質因素與觀念因素，才能對遼宋如何從交相侵攻到締結和約的過程做出更完整的闡釋。原本宋遼兩方都認爲主動進攻對自身有利，所以戰火不斷。在達到物質層面的權力平衡後，仍維持原本的觀念和行爲，直到遭遇挫敗後，才開始透過新的經驗教訓衍生出「進攻對自身不利」的觀念，進而從攻勢轉爲守勢，最後達成和平。在這個過程中，物質層面的權力平衡因素，要透過行爲者的學習機制才能產生讓行爲者改變觀念的效果。下一節將分別回顧側重物質性的權力平衡因素與側重觀念因素的兩類文獻，以及探討學習與外交決策關係的文獻，

---

[1] Thucydides 確實是目前學界通用之拼法，惟本文所援引之中譯本乃根據牛津大學出版社 1942 年的古希臘文版本翻譯出，該中譯本以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中 Thucydidis 的 *Historiae* 爲基礎，故本文參考資料所使用之拼法均爲 Thucydidis。特此感謝《政治科學論叢》編輯委員會對 Thucydidis 一詞正確性之提醒。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本文的分析架構。

貳、文獻評述與本文分析架構

一、探討遼宋戰爭與和平的兩種傳統觀點

(一) 側重物質實力的結構現實主義觀點

如前所述，史學家曾瑞龍曾以修昔底德的論斷作爲探討宋遼戰爭的出發點。在該論斷中，物質實力是影響戰爭與和平的因素，而且在時間上先於「恐懼」這個非物質因素。在修昔底德的記述中，雅典人在要求弱小的墨羅斯人臣服時曾將「主宰自己有能力統治的領域」稱爲符合自然法則的眞理（Thucydidis 著，何元國譯，2017：353），還建議墨羅斯人依據雙方實力對比來做出選擇：「凡能此者，無往而不勝；對實力與我相當者，平起平坐；對強於我者，識相知趣」（Thucydidis 著，何元國譯，2017：355）。

在千餘年後出任唐朝宰相的陸贄，提出了更爲細緻但基本邏輯類似的主張（陸贄，郎曄注，1991：128）：

> 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安得不存而撫之……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然也。

史學家陶晉生引述了陸贄的主張，認爲遼國與北宋「強弱適同」，並認爲陸贄之後，唐與吐蕃訂立的平等條約與後來宋遼澶淵盟約類似（1984：7-12）。

宋人王繪早已主張澶淵之盟是在雙方強弱適同的權力平衡情勢下締結的（2013：717），[2] 而後史學家黃仁宇（1989：235、238）；都興智、呂洪偉（2007：30-33）；武玉環、陳德洋（2007：49）；何忠禮（2007：94-95）都

[2] 「自古兩國議和，皆以勢力相孚，不能相下，於是有講和修睦之請、休息兵民之議，未聞以弱和強，彼初無畏憚，曲意定和者也。澶淵之役規模宏遠，昭然可見（王繪，2013：7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持此說。李錫厚認爲宋的軍力不弱於遼（2007：4-5），而國際政治學者王元綱即主張宋遼兩極體系下的軍事僵局導致了澶淵之盟（Wang, 2011: 53-54；2013: 214-216）。

本文同意上述論點。但遼宋在物質力量大致平衡之際仍在交戰，並未立即平等議和。丁樹範等認爲澶淵之盟是軍事權力平衡且經過評估的結果（2012：127-128），在物質因素之外添加了一個心理過程。其後更有學者引入建構主義觀點，對此進行更深入的研析。

(二) 強調觀念因素的建構主義觀點

林挺生在肯定王元綱的研究之餘，也提出了質疑。遼國在宋朝剛建立時近似單極霸權，爲何沒有趁機一統中原，反而讓宋朝逐步兼併南方各國，成爲足以抗衡自己的對手？從遼的視角來看，先前太宗耶律德光入主中原，但各地叛亂讓他在一年內北返，而且死在途中。此經驗主導了遼國的大戰略方向（林挺生，2017：85-86）。也就是說，歷史經驗影響到遼國決策者的觀念，使其行爲不符結構現實主義的預期。史學家陳述認爲，遼太宗之後的世宗時期，契丹正面臨進取與保守這兩種精神的爭鬥。世宗之後的穆宗趨重保守，對漢地不甚重視，不是因爲武力不足（陳述，1948：133）。

在評析宋太宗時期主戰與弭兵的論戰時，林氏從建構主義架構看到「國內政治層次上透過互動建立政策形成模式的過程；也從另一個角度質疑了國際結構決定國家行爲的武斷之處」（林挺生，2017：90）。他參酌建構主義學者「芬尼莫爾」（Martha Finnemore）的研究成果，重視體系參與者對物質能力的理解（林挺生，2017：93）。林挺生認爲，宋遼

> 經過最後一次武裝衝突的確認，雙方明確瞭解任何一方都再也無法以武力來迫使對方就範，才讓軍事手段之外的規範最終成爲主導性的力量（2017：97）。

> 東北亞的兩極體系並未發生變化，但宋遼之間劍拔弩張的對峙卻嘎然而止，雙方竟維持了百餘年的和平……藉助建構主義的架構……得到更豐富的歷史認識……要注意伴隨衝突而來的規範建構。規範之所以能夠持久地影響行爲，不單依靠武力的外在強制，主要還是由於行動者觀念上的改變（2017：98）。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資料庫

本文同意上述主張，但擬引入國際政治學者對「學習」機制的探討，以利更具體地說明行動者的觀念爲何會改變。

二、學習機制與本文分析架構

在「戈爾茨坦」（Judith Goldstein）與基歐漢等學者針對觀念與對外政策進行的一項研究中，他們二人將「觀念」界定爲個人持有的信念（Goldstein & Keohane, 1993: 3）。在此之後，李維將經驗性的學習界定爲「基於對經驗的觀察或詮釋，所導致的信念（或一個人對其信念的信心之強度）之改變，或發展出新信念、技能或程序」（Levy, 1994: 283）。如此就將學習與信念改變相連結。

有學者將其他要素納入學習的定義，將之界定爲「獲取導致行爲改變的新知識或資訊」（Jarosz & Nye, 1993: 180），或將準確性、有效性或是認知結構的改變納入學習的定義（Etheredge, 1985: 66, 76-79）。然而李維指出，這些額外要求並無必要，並提出了一個更有用的兩階段政治學習模式：第一階段是對導致個人信念變化之經驗的觀察與詮釋；第二階段則是信念改變影響到後續的行爲（Levy, 1994: 291），這也就是杰維斯在探討決策者如何學習時，提出的「事件→教訓→未來行爲」模式（1976：222）。

對本研究而言，杰維斯與李維關於學習與對外行爲的兩階段模式，適足以填補原先對於澶淵盟約形成之因果解釋鏈中的缺環。學者已點出權力平衡與和平間的關聯，也得知在這兩者間還有一個涉及觀念的變項。然而對原本習於採取攻勢的遼宋早期統治者而言，還需要遭遇某些事件，讓他們在詮釋之後開始認爲攻勢不再能產生有利的結果。在這些經驗事件中，杰維斯強調親身經驗以及最近的戰爭經驗特別重要（Jervis, 1976: 239-270）；李維則指出政策之成敗經驗的重要性：成功經驗使政策延續，失敗則促使政策改變（Levy, 1994: 304）。等行動者透過對經驗事件的觀察與詮釋學到「教訓」，才會改弦易轍。英國在 1890 年代爭奪非洲而引發所有歐洲主要國家的敵意，後來便與其對手和解（Snyder, 1991: 154）；日本在 1930 年代前，曾因擴張行動的負面效果而有限地收斂了對外擴張（Snyder, 1991: 114-115）；蘇聯也會在擴張遭遇有效反抗時學會收縮（Snyder, 1991: 212）。這些都可以視爲透過學習過程轉而採取較溫和對外作爲的案例。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綜上所述，本文採用杰維斯與李維的「事件→教訓→未來行爲」兩階段模式作爲分析架構。其中的「行爲」屬於依變項，含括發動戰爭的攻勢行爲與不發動戰爭的守勢行爲兩種可能。關於行爲發生前會經過的兩個學習階段，在此具體說明如下：

1. 從事件到教訓：用李維的話來說，就是「導致個人信念變化之經驗的觀察與詮釋」。宋（以及宋之前的中原政權）和契丹互動過程中發生的大事，尤其是行爲者親身經歷過的戰爭，讓他們認爲繼續維持原本的攻勢行爲不再有利，使得守勢觀念取代了攻勢觀念。
2. 從教訓到未來行爲：用李維的話來說，就是「信念改變影響到後續的行爲」。當決策者完全以守勢觀念取代攻勢觀念後，就會捨棄攻勢行爲，改採守勢。雙方都採守勢行爲就能達成和平。

在本文關於契丹與中原政權互動的個案研究中，戰爭是起始狀態，而宋遼澶淵和平是最終狀態。戰爭爆發後，要經歷許多事件，才能讓雙方決策者認知到權力平衡難以打破，所以不宜繼續發動攻勢，最後締結和約。在接下來的兩節經驗研究中，採用杰維斯與李維的「事件→教訓→未來行爲」兩階段模式，分別敘述遼宋如何經歷了這兩個階段，先後捨棄了攻勢信念與攻勢行爲，從而脫離戰爭狀態，達成和議。

參、契丹南征受挫與由攻轉守

建立契丹國的太祖耶律阿保機多次對外用兵，於 926 年消滅渤海國（脫脫，2010b：162），成爲所在區域內首屈一指的強國（王明蓀，2020：8；曾瑞龍，2003：39）。繼位的太宗耶律德光，藉中原政權內鬥的機會，得到石敬瑭割讓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的承諾，協助他推翻中原的後唐政權（葉隆禮，1968：12），在 947 年消滅石敬瑭建立的後晉政權並占領中原，正式建國號大遼，將年號改爲大同（脫脫，2010b：35-39）。德光當政時，「民眾兵強，莫之能禦」（脫脫，2010b：162）。從阿保機建國到德光征服中原這段期間，秉持攻勢信念與作爲的契丹大致處於上升態勢。然而從德光當政後期開始，甚至在消滅後晉前，就發生了不只一次足以引發對攻勢

臺灣大學圖書館

作爲進行反思的大事，最後終於改變了契丹的攻勢觀念與作爲。

一、南進受挫及其教訓

(一) 944 年（契丹會同八年）伐晉不利

該年契丹南侵，在馬家渡兵敗（歐陽修，2010：460），「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司馬光，1983：2809）。後來耶律德光親自率兵十餘萬至澶州城北布陣，看見晉軍的強大而發出感嘆（葉隆禮，1968：19；歐陽修，2010：460）。交戰後，「兩軍死者不可勝數……契丹引去」（司馬光，1983：2810）。據司馬光的敘述，契丹在馬家渡的潰敗讓許多士兵喪失鬥志。其後契丹與後晉在澶州城交鋒，改變了德光輕視晉軍的想法。不過這還只能讓他暫時撤退。

(二) 945 年（契丹會同九年）伐晉不利

耶律德光再度南進，在陽城遭到更大挫敗。追擊的晉兵甚至有機會追上棄車逃走的德光。後來他杖擊作戰不力的酋長各數百下做爲懲罰（司馬光，1983：2817；脫脫，2010b：37；葉隆禮，1968：21-22；歐陽修，2010：460；薛居正，2010：922）。此時契丹厭倦用兵，而耶律德光的母親述律太后也勸告德光，就算攻下漢人的土地，也不適合居住。萬一出了差錯將後悔莫及（司馬光，1983：2818；葉隆禮，1968：22；歐陽修，2010：465）。這是基於成本效益與風險考量，反對南侵。她還表示願意與晉議和（司馬光，1983：2818；歐陽修，2010：460-461；薛居正，2010：922）。這代表契丹高層已經有人明確地捨棄了對漢地的攻勢想法，並試圖說服仍秉持攻勢的耶律德光改弦易轍。

後來契丹雖然征服了後晉，卻在擄掠當地人民後遭遇反抗，「……多殺契丹守將……德光大懼」（歐陽修，2010：462）、「契丹大恐」（薛居正，2010：922）。遼太宗說「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而後以天氣轉熱爲理由北返（司馬光，1983：2834），在驚悸憂鬱的情緒下（王曉波，2011：8），於途中病發身亡（脫脫，2010a：3240；薛居正，2010：923）。前文已述及，林挺生指出此經驗主導了後來遼國大戰略的方向（2017：85-86）。

繼承遼太宗的世宗耶律阮，在領兵南征時被反叛者殺害（陳述，1948：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132-133；脫脫，2010b：41；曾瑞龍，2003：47）。《契丹國志》與《五代史記》都更詳細地寫出，諸部酋長不願意南征，而耶律阮強迫他們服從，然後叛亂者將他殺死（葉隆禮，1968：35；歐陽修，2010：465）。反叛者「利用的就是籠罩於全軍的厭戰情緒」（王曉波，2011：18-19）。接連兩位契丹皇帝的死亡都與對南方用兵有關。他們轄下的諸部酋長，於太宗時曾因在南方戰敗而受罰，於世宗時即反對向南用兵。這可視爲一項透過經驗學習之後，改變了觀念與行爲的證據。

二、改採守勢

中原的後周政權於 959 年北伐，未遭遇激烈抵抗就奪得石敬瑭割讓給契丹的益津、瓦橋、淤口三關與瀛莫二州（司馬光，1983：2913；脫脫，2010b：43；歐陽修，2010：466）。遼世宗的繼任者穆宗耶律璟得知此事後表示，這些地方本就是漢人土地，還給漢人也沒甚麼可惜（葉隆禮，1968：40；歐陽修，2010：466）。

史學家陳述認爲，以遼穆宗爲代表的契丹人士對南方的保守作法，承繼了先前述律太后反南進的觀念，不是因爲自身武力不足，而是不求占有漢地（陳述，1948：132-135）；王明蓀也指出（2020：15-16）：

> 穆宗無意於南進，除了鑑於太宗入主之失敗，也實因其對於漢地缺乏興趣之故……契丹政權對南進政策之修改，也即意味著對中原本土觀念的轉變。

經過遼太宗、世宗、穆宗三位皇帝，契丹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觀念乃至於行動的轉變終於完成，因爲中原政權通常仍有不弱的實力，使進攻的遼國必須付出不小的成本、承擔不低的風險；即使占領中原，也難以取得實質收益。後來宋朝對江南用兵時，北漢發兵侵擾宋朝，遼國還遣使阻止北漢（李燾，2004：330）。

宋太宗時期對契丹發動兩次北伐，於是後者再度多次大規模向南方用兵。雖曾取得勝利，但仍在宋軍激烈抵抗下損兵折將。遼軍先鋒大將蕭撻覽於 1004 年在澶州城下中箭身亡，士氣大挫。在此情形下，契丹主政者終於與宋朝締結了和平相處的澶淵之盟（王曉波，2011：92-101；曾瑿，王瑞來校證，2012：592；顧宏義，2017：136；Wang, 2011: 5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宋朝北伐受挫與由攻轉守

960 年，趙匡胤建立宋朝，取代後周政權，而後更陸續兼併荊南、湖南、後蜀、南漢、江南（李燾，2004：1-4、85、87、144、260、352），締造了遠比後晉甚至後周更強大的國家。接替太祖趙匡胤的是其弟趙光義，廟號太宗。他於 976 年登基，於 978 年兼併東南沿海的漳泉和吳越。夾在遼宋間的北漢也於 979 年被宋太宗親自率軍擊滅。他緊接著又立刻移師轉攻被石敬瑭割讓給契丹的幽薊地區（李燾，2004：381、426-427、451、454），點燃了此後持續約四分之一世紀的宋遼戰火。

一、北伐受挫及其教訓

(一) 979 年（宋太平興國四年）伐遼不利

趙光義攻滅北漢後，乘勝想奪回遼朝轄下的幽州。當時已有人指出此一行動難以成功，但趙光義並未接受（李燾，2004：993）。宋軍起初獲勝，但最後遭遼軍反擊，大敗於高粱河（曾瑞龍，2003：142-155）。宋太宗「僅以身免……竊乘驢車遁去」（脫脫，2010b：52），與 945 年時戰敗「乘奚車退十餘里……獲一橐駝乘之乃歸」（脫脫，2010b：37）的遼太宗如出一轍。敗退驚慌的宋軍士兵不知道趙光義所在，試圖擁立趙匡胤的兒子繼位，使趙光義不悅。隨後契丹大舉反擊，而宋軍一度「士眾疑懼，略無鬥志」（李燾，2004：460、462）。此前攻勢都很順利的宋太宗，願意開始考慮守勢。

980 年底，趙光義再就是否進攻幽州一事向大臣諮詢，李昉建議暫緩，被宋太宗接受。而後張齊賢建議「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事而已」（李燾，2004：484-485）。現代的史學家陳芳明在批判宋朝初年的弭兵論時，主張張齊賢的言論是弭兵論的一個轉捩點，並稱弭兵論不斷興起，使外交態度從外向轉爲內向，對宋太宗漸漸產生力量（陳芳明，1977：71-72）。

繼前述張齊賢後，田錫也上疏太宗「沙漠窮荒，得之無用……是勞而無功……願……無使曠日持久」（李燾，2004：499）。甚至太宗自己也對近臣說「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以而用之』，未嘗不三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李燾，2004：528）。不過在遼帝於 982 年過世的次年，宋太宗又對宰相表達收復幽薊的意圖（李燾，2004：533、557）。

(二) 986 年（宋雍熙三年）伐遼不利

趙光義於 986 年再次北伐遼國，同樣先勝後敗，光是在岐溝關陣亡者就數以萬計（脫脫，2010b：60），而後名將楊業殉國。「此後北宋朝廷喪失了獨立收復幽燕的信念……從心理上瓦解了宋君臣的進攻意識……轉爲消極防禦，主和妥協」（王曉波，2011：59-60）。沒有參與出兵決策的趙普得知此事後上書太宗，認爲北伐契丹是「以明珠而彈雀，爲鼷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宋太宗對趙普的回覆是「嘉愧實深」（李燾，2004：614-617），一方面肯定了反對北伐的主張，一方面對北伐的作爲表示愧疚。趙普反對向遼開戰的原因是覺得戰鬥風險高和政治代價沉重；「恐怕陷入長期消耗戰，損耗國力，是宋初文臣主和的重要觀點」（曾瑞龍，2003：206）。

宋太宗於戰敗後悔過，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太宗「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李燾，2004：618）。陳芳明認爲這是屈辱求和的意見，但或許是日後澶淵之盟的指導原則。此後，和契丹通好的議論便不時提出，主戰的力量減弱了許多（1977：74）。當初貪功首謀北伐的官員賀令圖及其父懷浦，也在此一年內都落敗，「天下笑之」（李燾，2004：625-626）。由此可看出輿論風向的變化。

第二次伐遼失敗後，契丹大舉反擊，宋朝「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創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鬥志」（李燾，2004：631）。趙孚在雍熙年間建議太宗（李燾，2004：635）：

> 不用干戈，不勞飛輓……望朝廷精選使命，通達國信……詔侍從文章之士，草國家禮命之書……議定華戎之疆，永息爭戰之事，立誓明著，結好歡和……有無相易，彼此從宜。

太宗對此表示肯定（李燾，2004：635）。此建議中的通使、劃界、貿易已與日後澶淵之盟內容非常相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改採守勢

989 年時，趙光義再要求群臣提出因應遼國的對策，而張洎在其長篇奏議中請太宗「稍抑自尊，舉通和之策」（李燾，2004：670）；王禹偁建議「宜作備邊之計……不必……深入敵境」，得到太宗與宰相趙普的大力肯定（李燾，2004：674）。大臣們都主張防禦和與遼通好，反戰主和成爲輿論主流（王曉波，2011：76-77）。

女眞於 991 年指控契丹妨礙女眞對宋朝貢，建議聯兵攻打契丹；高麗於 994 年因受契丹侵擾而請求宋軍援助，可是宋太宗都沒有接受（李燾，2004：728、789）。宋太宗晚年還說「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朕往歲既克并汾，觀兵薊北，方年小氣銳……靜而思之，亦可爲戒」，再對大臣表達反省之意（李燾，2004：758-759）。還有宋人將 979 年戰爭中所受的箭傷，視爲宋太宗過世的原因（王銍，1993：387）。

總之，曾瑞龍指出（2003：292-293）：

> 連串的失敗導致軍事信念受到衝擊，也引起戰略思維的轉向……在 986～1005 年，宋軍長時期從事防禦爲主的戰略，終於取代了……較富攻勢意識的戰略。

宋太宗之子眞宗嗣位後，便向契丹示好（脫脫，2010a：3466-3467），還在 999 年表示「當屈節爲天下蒼生」（李燾，2004：945）。到了 11 世紀初，遼宋雙方再經過最後幾輪軍事較量，確認沒有任何一方能壓倒對手後，終於在 1005 年 1 月達成澶淵之盟。

伍、綜合評析

遼、宋透過攻勢建立了不易被外敵消滅的物質基礎。遼太宗與宋太宗延續過去成功的攻勢作爲卻連番受挫。兩位太宗都曾在戰場上大敗，隻身逃離戰場，甚至有被敵軍俘虜的風險。關於戰爭高成本的經驗持續累積，而宋遼決策菁英也體認到，另一方是難以被征服的對手。在連年用兵付出重大代價後，各方領導階層逐漸從經驗中學習，開始檢討並捨棄從前有效

臺灣大學圖書館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的攻勢策略，而對勢均力敵的對手改採守勢，促成澶淵之盟。

本文描繪的過程符合前述杰維斯勾勒出的「事件→教訓→未來行爲」模型，以及李維對於成敗經驗和對外政策之關係的論述。未來還可以從這兩位學者對「攻守平衡」的見解切入（Jervis, 1978: 186-210；Levy, 1984: 219-238），再參酌其後國內外學者對「攻守平衡」的進一步闡釋（楊仕樂，2005：141-167；Van Evera, 1999），以利對澶淵之盟乃至於大國和平的成因進行更細緻的探究。

本研究的分析架構還可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省思宋遼和平爲什麼能夠長期維持。宏觀地說，東亞兩強權力平衡的局面，在澶淵之盟締結後約百年的時間內，並沒有出現重大變化，大國和平的物質基礎仍在。遼宋締盟後的東亞進入了一段和平繁榮時期，這樣的成功經驗就如同李維所言，有助於維持現行政策。

相形之下，當前的美中兩強若要維繫和平，會比千餘年前的遼宋容易。如今美、中各自領土面積接近千萬方公里，甚至超過昔年遼、宋的總和。日本在 20 世紀曾試圖征服中國、擊敗美國，卻像宋太宗北伐一樣先勝後敗。韓戰期間中美兩軍在朝鮮半島交戰，互有進退，而後達成停火協定。這些事實，再加上美中兩國顯而易見的核武嚇阻力，應足以讓北京與華府都不可能採取以武力征服對方或占領對方大片領土的策略。

另一方面，中美貿易以及高度互賴雖對前者的經濟發展與後者的物價穩定有幫助，卻數度成爲美中激烈交鋒的場域，並在川普時期達到高峰。川普加徵對中國商品的關稅，而中方也以同等力度回擊。在這段期間，雙方官員經常發表針對性的強硬言論。到了 2020 年 1 月中，雙方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這與澶淵之盟或韓戰停火協議類似，都是激烈較勁後妥協的產物。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生效後，中美間的較量仍然持續。各自擁有的龐大物質實力都足以自保，直接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低。現在美國可能採取甚麼樣的對中政策？晚近《外交事務》的編輯建議拜登政府從歷史中學習（Rose, 2021: 48-56）。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對蘇聯的圍堵以及 1980～1990 年代對日本經貿施壓，都得到了對美國有利的結果。如今對中採取過往行之有效的類似措施，是美方很自然的選項。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面對美方巨大壓力的中方可能如何因應？不論是 1950 年代的中共，或古代的宋朝與契丹，都是在戰場上多次抵擋對方的攻勢後，才使對手改變了先前的觀念與做法。如今中美並未眞正交戰，但在外交和經貿領域，北京也可以期望其採取的對抗或因應作爲，逐漸讓美方感受到不易承擔對抗的成本，從而改變作法。

美國在 2022 年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是通貨膨脹。若美國將對中關稅理解爲通膨的重要成因，就有動機考慮調降對中關稅，以平抑物價。儘管這並非出於對中善意，但至少可以阻止雙邊關係持續惡化。不過美方也能將通膨歸因到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或俄烏戰爭等因素，繼續以高關稅來迫使對手採取讓美國滿意的作爲。

反之，若中國認爲美國的壓力對自身構成重大威脅，也可能考慮配合美方要求以換取對方停止施壓。不過中方還能尋求其他因應方式，例如更加努力地提升物質實力，以尋求在對抗中取勝，或等待美方放棄對抗。

2020 年的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或其後拜登與習近平的會談，都未能像澶淵之盟那樣終結對抗。當年遼宋浴血交戰約四分之一個世紀才締和。在美中雙方遭遇成本巨大到足以改變對抗觀念的事件，而且決策者將這樣的事件歸因於雙方的對抗後，就有機會和解。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Thucydidis 著，何元國譯，2017，《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譯自 *Historia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Thucydidis. He, Yuan-guo. trans. 2017. *Boluobennisa zhanzhenshi* [*Historia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Translated from *Historia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丁樹範、黃恩浩、王俊評，2012，〈中國歷史上的「信心建立措施」：以宋遼軍事關係爲例〉，《遠景基金會季刊》，13(2): 99-141。Ding, Arthur S., An-hao Huang, & Chun-ping Wang. 2012. “China lishishang de ‘xinxin jianli cuoshi’: yi Song Liao junshi guanxi wei li”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China’s History: Song-Liao Military Relations as an Example]. *Prospect Quarterly* 13(2): 99-14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王明蓀，2020，《遼金元史論文稿》，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Wang, Ming-sun. 2020. *Liao jin yuan shi lunwengao* [*Draft Essays of the History of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New Taipei: Huamulan Culture Press.

王　銍，1993，〈默記〉，《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第九冊》（涵芳樓藏版），成都：巴蜀書社，頁 380-401。Wang, Zhi. 1993. “Mo ji” [Memory]. In *China yeshi jicheng dijiude* [*Collection of Unofficial History of China,* Vol. 9] (Hanfenlou zangben), eds.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ollection of Unofficial History of China* & 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 Chengdu: Bashu publisher, 380-401.

王曉波，2011，《宋遼戰爭論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Wang, Xiao-bo. 2011. *Songliao zhanzheng lunkao* [*On the Wars Between Song and Liao*].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王　繪，2013，〈紹興甲寅通和錄〉，顧宏義、李文（編），《宋代日記叢編》，上海：上海書店，頁 712-734。Wang, Hui. 2013. “Shaoxing jiayin tonghelu” [Seeking Peace in the Year 1134]. In *Songdai riji congbian* [*Collection of Diari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eds. Gu, Hong-yi & Wen L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712-734.

司馬光，1983，《資治通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上海涵芬樓景印宋刊本）。Sima, Guang. 1983. *Zizhitong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ance*].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hanfenlou jingyin Song kanben).

何忠禮，2007，《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He, Zhong-li. 2007. *Songdai zhengzhishi* [*Political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李錫厚，2007，〈論澶淵之盟非城下之盟〉，張希清、田浩、穆紹珩、劉鄉英（編），《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22。Li, Xi-hou. 2007. “Lun chanyuanzhimeng fei chengxiazhimeng” [The Chanyuan Peace is not the Carthaginian Peace]. In *Chanyuanzhimeng xinlun*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Chanyuan Covenant*], eds. Zhang, Xi-qing, Hao Tian, Shao-heng Mu, & Siang-ying Lio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22.

李　燾，200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Li, Tao. 2004. *Xu zizhitongjian chang bian* [*Extended Continuation to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anc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武玉環、陳德洋，2007，〈澶淵之盟與遼宋關係〉，張希清、田浩、穆紹珩、劉鄉英（編），《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49-64。Wu, Yu-huan & Dey-ang Chen. 2007. “Chanyuan zhimeng yu Liao Song guanxi” [The Chanyuan Covenant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ao and Song]. In *Chanyuanzhimeng xinlun*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Chanyuan Covenant*], eds. Zhang, Xi-qing, Hao Tian, Shao-heng Mu, & Siang-ying Lio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49-64.

林挺生，2017，〈天下一統或南北共存－宋遼衝突的國際關係理論驗證〉，《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3(1): 83-102。Lin, Ting-sheng. 2017. “Tianxia yitong huo nanbei gongcun: song liao chongtu de guoji guanxi lilun yanzheng” [All-Unified under Heaven or Coexisten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Theoretical Testing of the Song-Liao Conflicts].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3(1): 83-102.

黃仁宇，1989，《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臺北：時報文化。Huang, Ray. 1989. *Hexunhepan tan zhongguo lishi* [*Conversation on Chinese History by the Hudson River*].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陳芳明，1977，〈宋初弭兵論的檢討（九六〇～一〇〇四）〉，宋史研究集編輯小組（編），《宋史研究集第九輯》，臺北：國立編譯館，頁 63-97。Chen, Fang-ming. 1977. “Songchu mibinglun de jiantao (960-1004)” [Reviewing Disarming Discourses during the Early Song Dynasty (960-1004)]. In *Songshi yanjiuji dijiuji* [*Historiography of Song Dynasty,* Vol.9], ed. Editorial Committee of *Historiography of Song Dynasty*.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63-97.

陳　述，1948，《契丹史論證稿》，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Chen, Shu. 1948. *Qidan shilun zhenggao* [*A Draft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the Khitans*]. Peiping: National Academy of Peiping.

陶晉生，1984，《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Tao, Jin-sheng. 1984. *Song liao guanxishi yanjiu*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and Liao*].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脫　脫，2010a，《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元至正刊本）。Tuotuo. 2010a. *Songshi*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Yuan zhizheng kanben).

脫　脫，2010b，《遼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元至正刊本）。Tuotuo. 2010b.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iaoshi [*The History of the Liao Dynasty*].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Yuan zhizheng kanben).

都興智、呂洪偉，2007，〈「澶淵之盟」三論〉，張希清、田浩、穆紹珩、劉鄉英（編），《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23-36。Du, Xingzhi & Hongwei Lu. 2007. "'Chanyuanzhimeng' san lun" [Three Chapters on the Chanyuan Covenant]. In *Chan yuan zhi meng xin lun*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Chanyuan Covenant*], eds. Zhang, Xi-qing, Hao Tian, Shao-heng Mu, & Siang-ying Lio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3-36.

陸　贄，郎　曄注，1991，〈論沿邊守備事宜狀〉，無（編），《陸宣公奏議注（二）（卷十）》，北京：中華書局（據十萬卷樓叢書本排印），頁 127-139。Lu, Zhi, Lang, Ye tran. 1991. "Lun yanbian shoubei shiyizhuang" [On border defense]. In *Luxuangong zouyi zhu* [*Notes on Collection of Official Documents Drafted by Lu Zhi*], N. ed.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Ju shiwan juanlou congshuben paiyin), 127-139.

葉隆禮，1968，《契丹國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Ye, Long-li. 1968. *Qidan guozhi* [*History of the Khitan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曾瑞龍，2003，《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Tsang, Shui-lung. 2003. *Jing lue you yan: song liao zhanzheng junshi zainan de zhanlue fenxi* [*The Irredentist Yu-Yen Campaign: A Strategic Analysis of the Catastrophic Failure in the Song-Liao War*].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曾　鞏，王瑞來校證，2012，《隆平集校證》，北京：中華書局。Zeng, Gong. Wang, Rui-lai proofreading. 2012. *Longpingji jiaonhenn* [*History of the Early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楊仕樂，2005，〈攻守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44(1): 141-167。Yang, Shih-yueh. 2005. "Gongshou lilun zhengbian zhi pingxi"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Offense-Defense Theory]. *Wenti Yu Yanjiu* 44(1): 141-167.

歐陽修，2010，《五代史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宋慶元刊本）。Ouyang, Xiu. 2010. *Wudai shiji*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Song qingyuan kanben).

薛居正，2010，《舊五代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原輯永樂大典有注本）。Xue, Ju-zheng. 2010. *Jiu wudaishi*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Yuanji yongle dadian youzhuben).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顧宏義，2017，〈宋遼徐河之戰及其影響〉，無（編），《宋事論考》，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頁 124-136。Gu, Hong-yi. 2017. “Song liao xuhezhizhan ji qi yingxiang” [The Song-Liao War of the Xu River and its Impact]. *Songshi Lunkao*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on Song Affairs*], N. ed.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Co. Ltd., 124-136.

二、英文部分

Allison, G.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Allison, G. 2020. “The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Clues from History.”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eds. Leah Bitounis & Jonathon Price. Washington D.C.: The Aspen Institute, 79-95.

Dasgupta, S. 2021. “US is Seeking Coexistence with China, Not Cold Wars, Says Jake Sullivan.” in https://www.independent.co.uk/asia/china/us-china-coexistence-jake-sullivan-b1954090.html/. Latest update 28 July 2022.

Etheredge, L. S. 1985. *Can Governments Lear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Central American Revolution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Goldstein J. & R. O. Keohane. 1993.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eds. Judith Goldstein & Robert O. Keoha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30.

Jarosz, W. W. & J. S. Nye Jr. 1993. “Learning from History in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aking.” In *Behavior,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Vol. III,* eds. Philip E. Tetlock , Charles Tilly , Robert Jervis, Jo L. Husbands, & Paul C. Stern. New York: Oxford Press, 126-189.

Jervis, R.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Levy, J. S. 1984.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8(2): 219-238.

Levy, J. S. 1994.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2): 279-312.

Maddison, A. 2010.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in 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

臺灣人博碩士論文知識資料庫

ntal-file_02-2010.xls. Latest update 22 Mar 2022.

Organski, A. F. K. 1958.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 A. Knopf.

Pence, M. 2018.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Latest update 28 July 2022.

Rose, G. 2021. "Foreign Policy for Pragmatists: How Biden Can Learn from History in Real Time." *Foreign Affairs* 100(2): 48-56.

Snyder, J. L.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e World Bank. 2022. "The World Bank Data." i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locations=CN-US. Latest update 28 July 2022.

Van Evera, S. 1999.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ng, Y. 2011.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ng, Y. 2013. "Explaining the Tribute System: Power, Confucianism, and War in Medieval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3(2): 207-2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Balance of Power, Change of Ideas,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nyuan Covenant*

*Hsin-wei Tang***

Abstract

Why is it possible for two great powers to make a transition from a long-lasting war into a tim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Structural realists believe that a balance of material capabilities can lead to peace, while constructivists remind us that we cannot ignore ideational factors. Utilizing the two-stage model from Jervis and Levy, this paper integrates both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factors and takes the Chanyuan Covenant as an example. It describes how both the Song and the Liao first obtained a material basis sufficient for self-preservation and then in the process of further expansion encountered opponents that were capable of protecting themselves. After launching more than one unsuccessful offensive, both the Liao and the Song decision-makers fin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y had reached power parity and no longer thought that further attacks would be "profitable." Hence, they switched to a defensive position, concluded a peace treaty, and maintained it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Keywords: Chanyuan Covenant, Political Learning, Experience of Failure, Change of Beliefs

---

* DOI:10.6166/TJPS.202206_(92).0002
This article was born out of the briefing on "Liao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Xiongzhou Peace, Song Dynasty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Chanyuan Covenant" presented at the fifth conference of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December 17, 2021 and supported by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111-2410-H-002-076). Thank th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reviewers, journal reviewers,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for their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for their support.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hsinweitang@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